

/ 执政党研究丛书 /

执政绩效探微

战略、评估及设计

上海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编

秦德君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执政党研究丛书

上海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编

秦德君 著

执政绩效探微

战略、评估及设计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执政绩效探微:战略、评估及设计/秦德君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执政党研究丛书)

ISBN 7 - 208 - 06542 - X

I. 执... II. 秦... III. 执政—研究 IV. D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3648 号

责任编辑 齐书深

封面设计 储 平

美术编辑 傅惟本

· 执政党研究丛书 ·

执政绩效探微

——战略、评估及设计

秦德君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34.5 插页 2 字数 482,000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250

ISBN 7 - 208 - 06542 - X/D · 1135

定价 48.00 元

在科学的探索中,首先要处理那些应该首先
得到追问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谢 忱

感谢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信任和委托,并自 2003 年后的数年间,一直关心着课题研究的进展情况。

感谢原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叶尚志先生在炎炎夏日为本书作序。叶老多次表示,他十分赞赏政府部门的同志“不为浮云遮望眼”,多深入研究问题。88 岁高龄的叶老每天花一定时间审看书稿,写下洋洋长序,其热心和严谨负责之精神,令人感怀。

感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会长奚洁人教授在繁忙中热心为本书作序。感谢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前党组书记、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王邦佐教授对这项研究的关心。王先生对本书多有过誉。他还建议在书前的“概述”中,对整个研究情况作出说明,以使读者更好地阅读。

感谢刘世军博士、李明灿先生的诸多帮助。李明灿先生在组织专家对书稿审读后,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

感谢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唐丽萍博士组织学生为本书校稿。感谢上海理工大学副教授张爱阳博士和陈雪老师的热心帮助。

感谢我太太朱超美一以贯之的相助。她时常在工作之余为我整理资料、在电脑上工作至深夜,是很繁忙的“兼职打字员”。每一章完稿或修改后,她总是仔细核稿并提出修改意见。

感谢所有为本书提供过帮助的朋友们!

—

秦德君同志积长年学养、多年功力,写成《执政绩效探微:战略、评估及设计》这本洋洋 40 多万言大著。我谈不上仔细研究,浏览和粗读所关注的一些章节,得到几点难忘的印象和感想:

一是把执政和绩效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统一的命题,加以阐述。执政要讲绩效,争取绩效最大化是执政的职责和要义。如果执政没有绩效,叫做“无作为”,执政者便难辞其咎。实际上绩效有正有负,正效为主,可以评执政为及格或优良;负效多于正效,就不应评为及格了。人民国家评论执政绩效的主体是人民。这与剥削阶级专制的国家,人民在实际上失掉了评论的权利不同。只有发扬民主,人民可以评论执政绩效,才能体现当家作主,有效监督执政,推进政治文明和国家大治。

二是此书把执政绩效问题,放在世界的纵向和横面,包括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广阔时空,来加以研究和阐发。眼界深广、胸襟博大。从这种古往今来的宏观角度观察、探索执政绩效,别开生面。可以帮助人们大大拓展眼界,提高精神境界;有助于克服只关注鼻子尖下烦琐问题的鼠目寸光、狭隘保守和官僚事务主义。

三是搜集古今中外有关名家、典籍和历史经验阐释问题,内容丰富,不少论述很精到。

四是以执政绩效问题为核心,向周边有关方面展开论述;如同从一个圆心向四围辐射,对所要论证的问题的各个方面详加解析,使人得到立体多维、周密入微的了解。

五是作为一项承担的课题研究,既具有鲜明的学术性,又能联系我国实际,将有关的原理、知识加以运用,具有实用性。

我十分赞成在政府实际部门工作的同志多研究问题,发挥对政府实际运行十分了解、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优势。这种研究,往往更能切合社会生活的实际,更能解决问题。

我认为这本书既可提供各级领导咨政、决策作参考;亦可供有志于研究执政绩效、政治建设、政事改革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参考;还可推广于广大读者,作为推进人们对执政问题、现代政治文明普及提高的参考读物。我们不妨以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或以我国谚语所说:“四两拨千斤”,“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设想,把此书阐述的精华,以现代各种传媒手段,传播到广阔的社会角落。我想,以提高执政绩效为契机,会激发社会各个层面的活力,良性互动起来,符合中央要求提高执政能力的需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二

下边我从自身的角度,谈一点与执政绩效有关的管见。

任何社会制度,官民关系的性质与好坏,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执政及其绩效。这是研究执政绩效的一项重要前提。官与民是一对矛盾。一般地说,在旧时代剥削阶级统治(即执政)时期,由于阶级对立,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不同的剥削阶级,在不同的政策之下,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人物执政的条件下,官民矛盾或隐或现,或缓和或激烈,既有昏官、也有清官,既有酷吏、也有良牧,情况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但只要对立阶级存在,官民对立矛盾的基本性质和态势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的。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现代,旧的剥削阶级执政在官民关系上表现的烙印不可能消除。但资本主义社会一直以民主人权为标榜执政,具有欺骗性,又积几百年来的统治经验,不能不在官民关系上刻下印记。资本主义社会的官民关系,比旧的封建社会有所进步、有所不同。原因在于执政者不能不受选票、议会和民意一定程度的制约。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现个别的特例。例如瑞典,虽仍实行君主立宪政体,资产阶级仍

然存在,但经过选举常由左翼政党执政,不论称为什么性质的社会,但其经济发达,人均 GDP 超过美欧等发达国家,社会民主发展到较高水平。这个国家的总理、阁员随时有可能从民间选出。总理可以由农民担任,在职时的假日常常回去参加农业劳动,任职期满仍然回去当农民。全社会人人有住屋,人人有汽车,人人有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险。官民的收入和生活没有多少差别。那里的官民界限,事实上已经逐渐淡化,趋向消失。

按旧的一贯社会共识、惯例,从来都把政权及其部门的领导人员称为官员,但政党与政权不同,政党从来不属于官僚系列。党与民的关系不能称为官民关系,而应称为党群关系。任何国家都不把政党领袖称为官员。我国长期也遵循这一惯例,党内一律平等,都称呼为“同志”,非常亲切;与群众水乳交融、打成一片,结成紧密关系。这也是刘少奇同志和许多老同志过去只愿称他为同志,不愿称呼官职和党职的原因。但是“文革”之后打破了这一惯例,常把党内职衔当作官职称呼,而不称“同志”,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错位。

话又说回来,官与民的界线在现代能够完全消失吗?答案是否定的。官与民的界限今后仍然长期存在,但是他们之间关系的性质、表现则会演变。一般规律是,政治民主、精神文明发展程度越高,这种演变的幅度越大;反之官本位观念、官气、官架子,特殊化,脱离群众等等陈旧落后的风气易于存在和传染,官民关系向良性转化就缓慢。此消彼长,明若观火。官民关系演变的趋向是由陈旧传统的官贵民贱、官上民下的格局,逐渐向着官民平等、不分贵贱、不分上下转化,官与民的界限将逐步淡化、消失。不过这种趋势之间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官民两种身份的外壳虽仍然保持一大段时期,但实质上,正在逐渐悄悄地转化。特别是在人民主政的国家,官员的地位和职能,应该从人民一开始执政就意味着与传统的官民关系反其道而行之,向官民打成一片的方向转化了。那时执政人员除外交等场合外已不必要称为官员,顶多只称职衔。执政党领导人更不应以官职看待。总体来说,实质上都应把执政的党政人员认为是公仆、人民的勤务员。周恩来同志始终把“为人民服务”的牌子挂在胸前,昭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范例。这实际上是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算是回归本源,返璞归真。人民与他们的“勤务员”只有社会分工不同、而不应有等级区别。只有社会到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到很高阶段,阶级差别消失,政治成为人人参与的事务,从必然王国,到了自由王国,那时国家、政权便会逐渐消亡,官民的分工、界线、差别也就消失了。那时这一切只能在博物馆存在,官民关系这对矛盾便达到最后解决。

以上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的一点体会所作的漫谈,但与执政绩效决非无关。

三

过去动员亿万人民前仆后继,牺牲奋斗,夺取政权,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建设新社会。建国后我有幸长期参与党政系统工作,见闻所及,亲身体会到执政系统没有一件工作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取得良好绩效。从建国那年起多年来,中央、地方执政机关以全速马力推动,有几点是非常突出的:一是政务人员从上到下,夙兴夜寐,全力以赴,朝气蓬勃,看不到偷闲、怠惰现象。二是由根据地老干部带头,奉公守法,艰苦朴素,廉洁自律。1952年发现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一案,贪污浪费超过一万元,当作“大老虎”,立即查处、公示正法,起到了警钟的作用。自此廉洁勤政更加成风,遏制了贪渎浪费恶习。三是由此产生的执政政风:令行禁止,一呼百应,雷厉风行,效率很高。例如只经三年,便把长期战争破坏,造成混乱、匮乏的国民经济恢复到欣欣向荣。我国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丰富、厚重,对于执政绩效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参照系数,很值得借鉴。

执政涉及的是国家大事,任何国家大事的决策和推行,都应该以调查研究为先导,多谋善断。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要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培养高水平的智囊人才,广泛建立智囊、研发、咨询机构。既要发挥每位参与决策者的聪明才智、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又要集思广益,慎重拍板;既要发扬民主,又要有必要的集

中;还要有严密的监督和制约机制,防止因循、保守和僵化,贪渎、盲目和盲动;防止一言堂和群龙无首。这都是争取执政绩效最大化,又最大限度防止执政绩效受到损失、破坏的制度保证。

四

下边,我谈谈与执政绩效有关的几个问题:

1. 权力问题。执政拥有的权力,为什么那么重要,值得动员亿万人民的力量、不惜牺牲、付出,全力夺取和竭力巩固,就是因为它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最强大有力的工具,拥有它、用好它,可以左右政局和主导社会发展动向。权力的本质是由人民赋予,由社会产生的。权力用之于人民,就会还政于民,使人民求得解放和幸福;用之于社会,就会使旧社会得到改造,新社会得以建成。这正是人民革命及其政党所追求执政绩效最大化的唯一目标。

权力既是社会内在的产物,又可脱离和凌驾于社会而存在;既可以操纵,又可能失控。因此既要依靠执政者的道德品质操守和作为,来建立权威,取得免疫力,抵制权力的腐蚀性;更要依靠良好健全的民主与法治制度,把人们的行为引向正轨,防止失控。历史实践证明,权力的强大,需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综合力量来制约和治理。仅仅依靠人的道德品质不足以制约权力,必须依靠比权力更具权威、更强有力的法制才能制约权力。法制具有强制性,也有局限性;德治靠的是自觉,这一点比法制强。因此两者要互补和配合,才更有效、可靠。法制又是从权力派生出来的,因此从本质来说法制制约权力,也就是权力制衡权力,是权力内部的分工,权力内部的制衡。

2. 腐败蜕化问题。谈执政绩效,不能不面对权力的强大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正面作用不言而喻,负面作用不可忽视。如果不防患于未然,大力有效遏制权力的负面作用,往往成为政局不稳之源,不可能体现执政权力的真谛,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执政绩效,甚至有失去权力的危险。防止失职、渎职、贪污、腐败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普世的问

题；旧时代和当今治理不善的国家司空见惯，并不稀奇。防止党员蜕化变质更是马列主义建党学说早就揭示的要义。当今人民当政的国家和执政党内出现一些负面现象，不能不说是一个新的重大问题，不论有多大阻力，遇到多大困难，非解决不可。

放眼全球，当今有些国家反腐倡廉做得较好，证明腐败并非不治之症，如瑞典、芬兰、古巴等。有些发达国家积长期的统治经验，执政机体内部有一套制衡、管理、纪律、制度，有的执行得相当严格，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渎职腐败现象的蔓延。我们学发达国家的廉政，也不需经过几百年它们走过的老路，不少规章制度完全可以超越式地学到手。

中国共产党从井冈山起已有 80 多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育了宝贵的廉政传统。其基本的核心是永葆执政党的革命宗旨、本色和党员的革命人生观与艰苦奋斗精神，至今并未过时。现在改革开放，古今中外正面、负面样板很多，要择善而从，创新发展。我们有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团结统一、坚持先进性的强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内老中青党员一致渴望要大力推进廉政建设，以提高执政能力、增强执政绩效，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社会、广大人民一致期望，把廉政建设达到海晏河清的理想高度，以造福人民。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日新月异的前进路程上，深信一定会把廉政建设好。

3. 执政成本与绩效。执政的绩效，大体可以划分为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或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执政的经济成本和经济效益，大体是可以量化、计算出来的；但政治成本和社会效益就很难量化、计算，顶多只能估计，举其荧荧大者罗列出来，但重要性不可忽视。政治上的胜算和失算，以及政治成本多少和效益好坏、社会效果得失，其影响和作用，往往无法以经济、金钱来计算。经济工作者如果不懂政治，顶多只能成为一名经济事务的能手，决不可能成为一名参与经济宏观决策、驾驭经济大局的人才；反之，各级领导者，如果不懂一点经济理论、经济常识，不掌握起码的经济信息和数字，那就只能成为马大哈或空头政治领导者。这都谈不到能够达到执政绩效的最大化。

《执政绩效探微 战略、评估及设计》一书在论述执政绩效时，提出“执政成本”这一重要概念。尽管它与商业、经营有很大不同，但“执政

成本”这一概念的提出有积极意义,使人知道执政除政治运作需要付出代价和投入不好计量外,经济上也需要付出代价和投入某些开支成本,是可以计算的。有了这种计量,便可促使决策领导人员,对经济支出“心中有数”,重视精打细算,注重节约,减少开支,防止浪费;对当前有的人大手大脚,为了虚荣、私欲,一味追求奢华,大搞政绩工程,不惜劳民伤财加以节制大有好处。

我国家大业大,执政运作必要的开支虽是一个大数目,但这是必须付出的“成本”,是节省不下来的。但要看到,除必要“成本”之外的浪费大得惊人,大大超过必须的开支。如果按执政成本精打细算,勤俭节约,许多庞大的经费支出是可以大大减少的。这才符合节约执政成本,大大提高绩效的执政原则。

2006年7月23日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前常务副部长、
《人才开发》杂志社社长

当今世界,在任何现代国家,其国家行为的政治和行政绩效,都是一个关系到执政质量、执政资格乃至执政合法性的重大战略性问题。虽然行政绩效的科学评估日益为人们所重视,但实质上,我们今天尚未真正找到考量公共部门绩效的比较科学而又简便易行的办法和路子。特别是当我们把行政绩效问题提升和引入到执政领域时,这一命题就更具有了挑战性。由于执政绩效问题牵涉复杂,又缺乏约定俗成的学术概念、范畴和技术路径,使这方面的研究更需要智慧、勇气,并要有充沛的开创性精神。

本书对于执政绩效问题的研究,是一项在学术界执政理论研究领域和公共管理实际工作中都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研究,也是一项创新性程度和研究难度系数都较高的研究。

《执政绩效探微:战略、评估及设计》一书通篇都在回答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即什么样的执政是有绩效的?如何实现执政产出的最大化?我认为,这项研究以下两点尤其值得重视:

一是在学术上,作者力图通过系统的研究,使“执政绩效”成为一个独立的范畴,为以后执政绩效的进一步探究树立起一个标杆。二是实践操作上,作者力图使“执政绩效”成为一种既体现数量关系、又反映人文内质的技术手段,使国家行为的公共绩效成为可进行具体评估和测量的技术系统。毫无疑问,这两项努力,无论其最终结果是否科学、完美,对于提高执政水平都是有益的尝试和重要的贡献。此外,书中不仅有着丰富的创新性理论、创新性理念乃至新概念、新话语、新观点,还有着大量典型案例和对绩效黑洞、政策收益等实际政治—行政运行过程独到而深入浅出的分析,可读性和资政功能非常强,很值得各级领导干部一读。

今天,我们不仅要在我国公共部门的各个层级中特别是在担负着领导责任的领导者群体中,普及“执政成本—执政收益”理念,它有利于

有效遏制“政绩冲动”和各种不切实际的高成本、低收益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要使“执政成本—执政收益”成为各级公共部门可切实推行和普及的技术系统,成为一种具体方法,以提高各级公共部门切实推行绩效管理的可行性。

这项研究成果既借鉴了国外学术界比较流行的公共研究的一般方法,即以重大公共问题、公共利益为核心,遵循“公共精神”展开探索和研究,又对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实际经验和改革理论进行了认真研究总结。研究成果不仅具有理论性和开创性的特点,还具有了操作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德君博士的优势,正在于他既有着良好、扎实的公共管理和政治设计、行政设计方面的理论积淀,又长期在政府从事实际工作,掌握着政府运行、制度安排、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等方面十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据我所知,为完成此课题,他潜心勤进,历经四载,几乎为此奉献了所有的业余时间,可谓呕心沥血。也许这就是他的研究成本,但我以为他的收益也是很大的,我相信本书的读者会对此作出公允的评价。

我期待这项研究成果,在党的执政理论研究中发挥它应有的理论功能,在公共管理实际工作中发挥它应有的资政功能。在干部教育和培训工作中,我们深感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性和有质量文本的阙如。《执政绩效探微:战略、评估及设计》的出版,弥补了这一领域的不足,也为干部教育和培训提供了一部有质量的教材。我们也希冀有更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政府部门的同志,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关注和参与“执政绩效”这一重大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为提高党的执政绩效、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共同努力。

2006年7月23日

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
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会长,教授、博导

概 述

当代世界各国执政实践表明,一种理性的执政形态,除了具有法治执政、廉洁执政、人本执政、集约执政这些内质外,还必须具有“成本执政”的品质,注重提高执政绩效,大力降低行政耗费,实现社会代价与社会收益之间、执政成本与执政产出之间的平衡,实现执政目标和执政收益的最大化,同时实现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的最大化。

执政绩效是执政的业绩和效能,反映的是执政的公共产出情况。执政绩效是由执政成本与执政收益两者的比率而言的。执政收益是一定执政成本支付下的收益,执政成本是为取得执政预期目标而支付的耗费。执政成本高,就意味着执政绩效低;执政绩效低,则意味着执政成本高。执政绩效的评估,可依据效力(Effectiveness)与效率(Efficiency)两方面进行评价。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在全世界的一切政府中,公家都是只消费而不生产的。那么,他们所消费的资料从何而来?那就是来自其成员的劳动。正是个人的剩余,才提供了公家的所需。由此可见,唯有当人类劳动的收获超过了他们自身的需要时,政治状态才能够存在。”卢梭关于政府“只消费不生产”的判断是不甚确切的,公共部门是有“产出”的。它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就是它的产出(Output of Government)。但是卢梭指出的“政治状态”依赖于社会物质生产之“剩余”,却是相当重要的,也就是说,“政治状态”运行的成本,“来自其成员的劳动”。所以在伦理观察上,有绩效的执政,必须是低成本执政、节简型执政。反过来说,一种高成本的执政形态,一定是低绩效甚至无绩效的。

现代社会政党执政,系指经过宪法程序或其他政治途径,执掌国家公共权力。毫无疑问,执政行为必须具有“法理正义”,但同时,执政行为还必须在耗费与绩效问题上体现出“伦理正义”:重视成本理念下的执政产出、重视以合理的成本支付实现执政目标的最大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意义的考量,也是区别正义与非正义,是否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分水岭。历史上,一切非人民性的政权都是大量耗费民脂民膏、不体恤民情的。

1871年,马克思在论述巴黎公社时,在热烈称赞巴黎公社精神的同时,曾深刻指出,代表人民的政权,它的特质应该是低成本的“廉价”政权和“廉洁”政权。今天我们的执政领域,面临着日益繁重的任务和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环境,但是立党为公的权力结构,无疑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倡导的轻质型结构,执政形态应该是重绩效的节简型形态。由此,执政的成本和绩效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涉及执政正义的伦理问题。

一

今天世界各国的政治—行政过程,本质上都属于科层机构(Bureaucracy)和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Public Goods)这样一种范畴。科层结构缺乏竞争性、非利润化和敏感性迟滞等固有特点,使各种非绩效行为如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权力扩张、冗官沉疴、大包大揽、行政繁杂、扯皮推诿、即兴决策、劳民伤财的伟业冲动和政绩偏好,以及腐败、奢侈、浪费等,有可能大量产生。而由于执政主体执掌着公共资源,“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不计成本、不惜代价、不节民力的行政惯象,很容易构成公共运作中的“绩效黑洞”。

比如,公共部门有不断扩大部门权限的趋势,导致政府体量不断扩大并低效率。欧美国家在19世纪时曾为议会主导,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环境运动的推进,政府权力不断扩张和膨

胀。在东亚国家,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在国家生活中政府一直担纲着强势角色,公权处于不断膨胀之中,加上20世纪中期以后东亚走上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客观上需要有足够的政府权威,这使公权成本大幅度上升。

贯穿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始终的“经济人”假设,同样适用于构建官僚行为模式。官僚追求个人或部门利益的行为,与政府支出之间存在某种关系。正如威廉·尼斯克南(W. A. Niskanen)运用“经济人”假设做出的解释那样,官僚追求的个人利益是其所属部门权力的最大化,由于部门权力和其所控制的资源规模成正比,在拟定公共预算时,预算成本总是大大超出实际所需。各官僚机构的预算成本都有扩充的冲动,政府公共支出必然扩大。这样,科层的结构、体制和行为时常面临低绩效、无绩效甚至败绩的可能。

世界范围内,执政低效率现象是相当普遍的。有的执政主体虽然总体上避免了低绩效,但在某一时期,也会出现持续低绩效。当今世界各国的执政经验表明,由于今天社会所处日益复杂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执政的低绩效是难以规避的。正因为如此,21世纪席卷全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重要内容,就是公共部门推行绩效管理(Performance Management)。要求在作出公共决策时,在制定任何一种战略、提出任何一种口号、作出任何一种决策、展开任何一种改革时,都要进行成本决策和绩效决策,推行绩效测量(Measurement of Performance),尽可能减少公共耗费,扩大公共收益。

老实说,公共绩效中的成本收益理念,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古代智慧中,早有这方面的内容。如《论语·尧曰》中记载说: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孔子提出的“惠而不费”,就有成本、收益和政治艺术的理念。《荀子·富国》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民生多艰,为人民谋